

敦煌古代儿童课本

● 汪泛舟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DUNHUANG WENHUA CONGSHU
敦煌文化丛书



敦煌文化丛书

敦煌古代儿童课本

汪泛舟
编著

DUNHUANG WENHUA CONGSHU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简述

(代前言)

敦煌自汉而宋，一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中西交通的都会。在这一历史时期，敦煌不仅产生过大批硕儒学子，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包括儿童课本在内的汉蕃文化的丰富资料。其中出自藏经洞的许多儿童课本，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的一致性，也显示了敦煌地域的特点。这些儿童课本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仅在敦煌地区流行的就超过 20 多种，写本已有 200 多个卷号。按其内容、性质、重点，约可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

一、识字类

敦煌识字类儿童课本亦多，并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一) 文字多不相连的单纯识字课本

这些课本，有以声系字的，有注汉字直音的，也有以反切注字的；但其中尤以既无韵、类系联，又无加注的字书为多。这里，仅就典型的加以引述之。

(1) 以韵系字的《字书》(S.6329)。如：

齐人姓 犁耕具 低高低不平 羝羝羊 啼哭

材材干 栽种 猜猜疑 胎胎子 孩小儿

S.6329《字书》，残存11行，每行6字至8字不等。一行一韵，每字下都有注字。这里移录的第二和第十行，它们分别是以《广韵》十二齐（齐）和十六哈（材）韵系字。这种韵书体例的《字书》，既使儿童识字，又使儿童知义、知韵，并由识一字而又知它字的编写特点，能有利于儿童智慧的启迪和培养，实是一种识字的好课本。

(2) 以类系字的《新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S.610)。如：

二仪部第一：澡浴、扫洒、西关命餐、东阁延宾……

这是以2字为主、间有4字短语的字书。由于它是以类系字的，又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字，所以，也是易于儿童学习掌握和实用的。

(3) 加注汉字直音的《诸杂难字一本》(P.3109)。如：

诬无 忌巨 鄙比 蔽闭 赭者 策主 鼈别

该卷字书完整，书写较佳，题下有“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记”7字。全书凡500余字，多不注音，仅在少数字下加注汉字直音，这可能或与敦煌地区保留的某些方音（多系古音）相混或某些字难读等原因有关。

(4) 分卷《难字》字书(P.2948、S.5690)。如：

第二卷：陋、李、癖、盲、皆、临……

此类《难字》字书，不兼韵、类，仅以分卷形式随意收字。在1卷至7卷500多难字中，只有“梨”字下出现反切加注。这



说明本字书，是专供具有一定识字基础儿童为扫除难字障碍而编制的。

(5) 正字、字样书 (S.388)。如：

《字样》、《正名要录》(S.388)、《新商略古今字样》(S.5731、S. 6268)、《时要字样》等类。这些字样，都是唐代便于汉字规范而颁行于天下的，自然亦属儿童学习识字的课本。《正名要录》自序谓：“依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析折衷”而成。书名下有“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的作者署名。可见，《正名要录》是依颜师古《字样》编写的，属于当时的正字书（古人称“字”为“名”），并具有识字的许多好处：①可知字的正体与俗讹：如“妇”，正，“𡚦”，俗；“归”，正，“皈”，俗。②可知字的古今二体：如“棲”，古，“栖”，今；“鉏”，古，“锄”，今。③可知字的同义异字：如“祥”注“福”；“忠”注“直”……那时，儿童们通过《正名要录》、《时要字样》等字样课本的学习，既能明确汉字的正俗与古今，同时，也有利于对字义识别与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以及汉字的规范化。

在敦煌儿童识字课本中，有的书里多出现有“鲇、鲤、鳟、鲂、柑橘、槟榔、茱萸”等南方物名 (S.5513)；有的书里却写着“干桎、箛簾、花毡褥、饊饼”等北方的土产和特产，这恰好说明了敦煌儿童字书的丰富性，及其中原和地方知识兼有的特点。

(二) 语句连贯、押韵，并有意义的识字课本

这些课本，有《千字文》、《开蒙要训》、《蒙求》等，并且都是风行于中原与敦煌的通用教材。自宋以后，除《千字文》（因已家喻户晓，不再专述）、《蒙求》外，《开蒙要训》却于中原佚亡了，幸赖敦煌藏经洞将其写卷保存了下来，方始我们能于 1300 余年后的今天可以再次读到这一古代儿童课本。





《开蒙要训》，为六朝马仁寿撰，敦煌出土凡有 27 个写卷。其书略早于《千字文》，并侧重于以生活和生产知识为主的识字课本。它的内容虽与《千字文》不同，可是由于实用性的原因，遂使《开蒙要训》也同《千字文》一样，是一种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儿童习诵课本。从内容上看，它涉及天地、岁时、山河、君臣、伦理、婚姻、纺绩、人体、疾病、珍宝、器皿、饮食、农事、商贾、烹饪、房舍、储备、园艺、昆虫、鱼蛇、鸟兽、禽畜、缉盗、狱审等各个方面，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家治国的社会生活知识，具有着百科全书的性质和容量；从形式上看，它既依类系字，又表意义，并由“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 1400 个不同的汉字组成了全篇。这种包含 350 句、175 韵的韵文课本，在敦煌地区流传了近 500 年。由于其书在声韵上多与《广韵》未合，遂引起了老一代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主要依据《开蒙要训》写本中的注字，撰写了一本《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专书，影响学界近 70 年。这次，《开蒙要训》被编者选收，并作了注解式的研究，因此，编者以为：《开蒙要训》里有些注音，又多与《切韵》相通，应属《切韵》系统的用音。此书收字的广泛性和知识的实用性，又是《开蒙要训》能与《千字文》一样，长期流传于敦煌，并成为儿童喜爱课本的原因。

《蒙求》，为司仓参军李瀚撰。此书也是流传于敦煌地区的一种儿童课本，但写本较少，仅见 P.2710、P.4877 两个残卷，并敦煌研究院藏 95 号的一个残卷，凡三个卷号。敦煌本《蒙求》，除保存有一篇 440 字左右的完整的序言外，还有加注的正文 50 句、25 韵。起《切韵》东韵，次为歌、姥等韵。如：

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飞熊。

伏波标柱，博望寻河。李陵初诗，田横感歌。

武仲不修，士衡患多。桓谭非讖，王商止讹。

这种以经传故事汇辑而成的儿童课本，还是符合儿童猎取新奇等某些特点的。但或许编选历史故事琐碎诸多原因，遂使此书在敦煌地区流传偏少且残，幸有《学津》、《畿辅》二丛书，都为我们保存了正文完整的《蒙求》，始知此书 298 韵、596 句、共 2392 字，但无序言。而敦煌写卷《蒙求》序全、文残，这样，敦煌本《蒙求》，对于《学津》、《畿辅》二丛书里的《蒙求》来说，又具有补全璧合的价值。仅此，亦是十分可贵的。

（三）姓氏识字课本

敦煌姓氏书，约有 6 个写本。

P.4630《百家姓》，为中原一直流传的四字一句、依韵编排的姓氏课本。该卷残存两页，仅有“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鬲于，大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诸句。其中除“鬲于”于今《百家姓》作“单于”未合外，余皆相同。P.4585《百家姓》，学界定为唐写本，残存 24 行，起句为“赵钱孙李”4 字。这种以“赵钱孙李”为首句的《百家姓》，过去学人都以为系宋人编撰。如果 P.4585《百家姓》写卷定年不误的话，而这一课本，在我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又具有其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

在敦煌姓氏课本中，还有中原不见的《姓望书》（S.5861）、《郡望姓氏书》（P.3191）、《姓氏书》（P.2995）、《姓氏录》（北图 8418）等 4 个写卷。而这些姓氏书，正是敦煌地区姓氏课本更为多样的当时历史记录。如：

张王李赵阴萨唐邓令狐正等安康石平……

任多泊浑苏钜符星傅解圆穆胡辛申冯

这种首起“张王李赵”，尾结“胡辛申冯”的姓氏书，乃是根据敦煌地区的姓氏现状编写的，又是明显不同于中原系统的《百家姓》的。



今从敦煌6个写卷的姓氏课本考知：古代这一地区使用的姓氏课本，既有来自中原系统的《百家姓》，也有根据敦煌及其周边民族实际而编写的姓氏书。可见，当时敦煌的姓氏课本，又是具有中原与边地兼有的特点的。

二、教 育 类

在敦煌古代儿童课本中，还有如《百行章》、《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新集严父教》、《孔子家语》、《论语》、《孝经》、《崔氏夫人训女文》等以训诫、教育为主的一类。这类书籍，都是以突出的儒家思想对学生进行立身、处世的道德伦理教育为其内容的。敦煌地区这类课本，当然也是以中原常见的《孔子家语》、《论语》、《孝经》等为主，同时，还包括中原早已佚亡而被藏经洞保存下来的《百行章》、《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类。



《百行章》，为初唐杜正伦撰述，敦煌文献里存有13个写卷。全书约近5000字，由序言168字和正文4770余字组成。正文凡84章，每章标题，各有中心，并以忠孝节义、清廉宽信等统摄全书，是一部直关齐家治国的应读书籍。由于该书重在提倡忠孝和为官为民的诸多内容，所以，也大量摘引了儒家等经典中的许多“要真之言”。如：

孝者，百行之本，德义之基；在家能孝，于君则忠。

居官之体，忧公忘私；受委须达，执事有功。

富贵在身，须加赈恤；饥寒顿弊，啜味相存。

茅焦就谏，始皇见而归愆；荀息累篡，虞公睹而取过。

邦有道，则仕其明朝；邦无道，则卷于怀。

但以桑中之弊，尚致扶轮；并粮之恩，须报泉路。

居官思贱，居富思贫；怜贫恤老，抚育孤穷。

身当宠贵，不可以势凌人；若守困穷，不可苟求朝夕。

人前莫令涕唾，同食勿先嗽口。

朋友有难，事等孔怀；凡人有丧，皆须匍匐。

若赏不相功，罚不当罪，虽率士卒，无用力焉。

.....

其上录列的一些警语，又多出自《论语》、《孝经》、《诗经》、《礼记》，故事也多源于《左传》、《史记》、《说苑》、《吕氏春秋》等典籍。再者，该书文字通俗易懂，并把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具体化、形象化，所以，《百行章》也就成为唐代一直流传的敦煌各类学校的一种通用儿童教材。但是，由于《百行章》不像《太公家教》以教人学习、立身等为主，而是侧重于为官为民等为其基本内容的。因此，其书当属于较高一级的儿童课本，这也是敦煌地区《百行章》写卷不及《太公家教》写卷之多而仅见 13 个卷号的主要原因。

《太公家教》，佚名。敦煌文献中遗存有 36 个写卷，并见 7 个写卷后面书有学士、学士郎的 9 人诵读题记。可见，《太公家教》在唐宋之际的敦煌各类学校被普遍采用的情况。此书内容丰富，包含着教人文明礼貌、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虚心好学、认识影响、去恶从善、莫听谗言、礼贤下士、避嫌修身、教育子女等等方面。如：

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小儿学者，如日出之光；长而学者，如日中之光。

老而学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学，冥冥如夜行。

助祭得食，助斗得伤；仁慈则寿，凶暴则亡。

宽则得众，敏则有功；以法治人，民则得安。

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

智者不见人之功，愚夫好觅人之耻。

圣人避其酒客，君子恕其醉士。



人相知于道术，鱼相望于江湖。

君浊则用武，君清则用文。

屈厄之人，不羞执鞭之事；饥寒在身，不羞乞食之耻。

.....

语言通俗而又散韵相间的《太公家教》，凡 580 余句，2610 多字，并由序言、正文、后跋三个部分所组成。书中用典约有半数以上，语句又多摘自《礼记》、《孝经》、《论语》、《诗经》、《孔子家语》、《史记》、《庄子》、《汉书》、《说苑》、《大戴礼记》诸篇。其书内容既符合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又有激励学生勤奋上进精神，并由忠孝、爱人、修身、礼仪等一条儒家思想贯穿始终。因此，《太公家教》一书遂成为唐宋敦煌地区儿童喜爱诵读的、且写卷遗存最多的一种儿童课本。

《新集文词九经抄》，佚名，敦煌石室存有 P.2557、S.5754 等 16 个写卷。对于这一课本校理与研究，迄今仅见有台湾郑阿财先生的《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专书出版，从而为敦煌古代蒙书教材做出了“古为今用”的重要贡献。



该书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序言起于“包括九经，罗含内外”，止于“何其愚惑者矣”；正文起于“贾谊曰：‘有冲天之翼者，必不栖息于桑榆’……”，止于“庄子曰：‘丛兰欲羞，秋风败之’。”全书约 4000 余字，又为杂言散文体组成。其书中有九经诸子语（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有不见史传的刘通、刘会语（如“居官政色者，不刚不柔”和“投石于江河，则万载而不闰”），还有谚语（如“生男如狼狗，恐其鼠；生女如鼠狗，恐其虎”），以及《孝子传》中的故事（如“董永卖身葬父母，天女蹈机”，“郭巨埋儿养母，天赐黄金”），等等。

尽管《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涉及的内容繁杂，但其中心

还是教人守义、敬孝、为善、知礼的，体现的仍是儒家的礼教思想。该书中还杂引有《太公家教》中的许多语句，据此，编者曾与《太公家教》作过对比研究，同意郑阿财先生的关于此书晚于《太公家教》，约产生于中、晚唐时期的观点。今从其众多写卷和题记察之，《新集文词九经抄》也是广泛流传于唐宋敦煌地区的一种儿童通用课本。

敦煌地区还遗存有4个写卷（S.3904、S. 4307、S. 4901、P.3793）的《新集严父教》课本。它虽不像《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那样，为中原和边地普遍采用的通用教材，但从S.4307卷的“安参谋学侍（士）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的尾题上却已证明：它也是10世纪左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蒙书之一。该书每句五言，六句一章，总九章，凡270字。这种分章而又由五言韵语组成的《新集严父教》课本，更将儒训融于日常生活的说教之中。如：

二章：遣子避醉客，但依严父教。

路上逢醉人，抽身以下道。

过后即来归，寻思也大好。

五章：家中学侍奉，孝顺伯亲老。

处分莫相违，但依严父教。

枷杖免及身，寻思也大好。

八章：我劝世间人，但依严父教。

君子有困穷，小人贫穷盗。

三乞胜一偷，寻思也大好。

关于此书，台湾学者朱凤玉教授曾有专文研究，考析甚详，指出是属于家诫一类的教材（见《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交流文章）。由于《新集严父教》语言十分通俗，又系简短易诵的韵文，加之每章结句的重复手法的运用，因此，更使《新集严父教》读之活泼上口，



同时，亦利于学童的记忆。然而，该书未能为当时敦煌州、县、寺、巷各类学校所普遍采用，这也可能与它篇幅过短和语言过俚有着直接的关系。

敦煌文献中，还遗存有 3 个写卷（S.4129、S. 5643、P.2633）的《崔氏夫人训女文》课本。该书每句七言，为“两句一韵，两韵一节”形式：总 8 节，16 韵，32 句，凡 224 字。其内容主要是训女敬事翁姑、和睦家庭、尊卑守礼、顺从丈夫等几个方面的。如：

“香连宝马竞争辉，少女堂前哭正悲。

吾今劝汝不须哭，三日拜堂还须归。”

“路上逢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汤前。

外语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

“早朝堂上起居了，诸房叔伯并通传。

妯娌相看如鱼水，男女彼此共恩怜。”

“夫婿醉来含笑问，迎前扶持送安眠。

莫向人前相骂辱，醒来定是不和颜。”

.....



今从全书摘录 4 节，亦见其书的风貌之一斑。文中的“香连”，即“香奩”，指妇女盛放香粉、梳镜等物的匣子。“连”、“奩”古通；汤前，即荡前，谓不要放荡于尊卑人的面前。“汤”、“荡”古通。而《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敦煌文献中仅见的训女类的可贵教材。它不仅反映了唐宋时代敦煌地区少女识字儒训情况，而且还为我们保留了当时婚姻民俗史料。此书因假借崔氏夫人训女的口吻，令人于诵读中倍感亲切；而其语言的通俗化，也使该书易学、并为当时少女们所喜爱和接受。因此，《崔氏夫人训女文》也就成了唐宋时代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唯一的一种训女课本。

三、应 用 类

敦煌应用类儿童教材，也是中原与地方兼用的情况。在先唐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期，中原的儿童应用教材也多已佚亡，今天我们能见的仍是敦煌藏经洞遗存的约 100 余种写卷。这些应用类教材范围亦广，兹略去其他的“文范”部分，仅述及其中的习字、书仪、字典、算书几个方面。

(1) 习字：敦煌文献中有《上大人》习字 4 个写卷(P.3145、P.3797、P.3806、P.4990)，均为唐代儿童习字的教材样本。

古代儿童一面读书识字，一面还要练习写字，以达到学写一致的目的。而儿童初学复杂汉字时，宜从简单易学入手，于是，儒师们便编制了像《上大人》这样的教材：“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P.3806)这种既包含着尊孔思想，又多为笔画简单的、古称“字帖”的习字教材，更是符合封建教育宗旨和儿童易学的特点的。

《上大人》习字教材，自唐以后，既见于宋·僧普济《五灯会元》里记有宋·朱熹《答潘叔品书》中提到的“上大人”语；也见于元·方回抒写的“忽到古稀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的诗句，等等。这些，都说明了《上大人》习字教材在自唐以后的中国一直不变地流传着，并成为儿童习字描红的一种格式。这一习字教材，不仅具有汉字习写过程的科学性，而且也反映了它自唐以来的、源远流长的历史。

(2) 书仪：古代的书信等交往，都是具有一定的书定格式的，所以，敦煌石窟里遗存有中原和边地的多种形式的书仪写本。而这些多样的书仪写本，既是人们日常交往必不可缺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儿童必须学习的一种课程。

唐五代书仪种类繁多，流行于敦煌地区的多是由中原传入的像杜友晋《吉凶书仪》(P.3442)、《书仪镜》(S.329、S.



361)、《新定书仪镜》(P.3637等)和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S.6537)等类;同时,也还有敦煌人张敖撰写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P.4050、S.5613)、《新集吉凶书仪二卷》(P.2646、P.2556、P.3246、P.3249)两种。这些书仪基本上反映了唐前至五代数百年间的中国书仪的总貌。由于书仪是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所以,《新集吉凶书仪二卷》的作者张敖于自序中申述道:

“人之有礼即安,无礼即危,以识才通明于礼仪。是以士大夫之家吉凶轻重而礼经繁综,卒难寻检。乃有贤士撰集、纂要吉凶,号曰《书仪》,以传时世,实为济要。自大唐前后数十家著述,纸墨颇繁,理词归一……所以综其旧仪,较量轻重,裁成一纸,亦尽哀情。今朝廷遵行《元和新定书仪》,其间数卷在于凡庶,固无所施,不在于此。今采其的要,编其吉凶,录为两卷,使童蒙易晓,一览无遗,故曰纂要书仪,叙之云尔。”

在大唐前后,流传的书仪繁琐,多不切时要。所以,张氏从“童蒙易晓,一览无遗”出发,遂编撰了更适合于敦煌地区儿童需要的简明书仪教材。如:

朋友有疾相问书 (P.3502)

自从分别,久不知闻,相恋之情,不可言述。今者春临向晚,暄景

甚繁:柳絮轻飞,桃花散锦。忽承痾疾,计已痊平。积善日深,况

招余庆,善加将摄,以慰鄙情,△△属缘公务多端,未蒙奉谒,中心恳望,岂可喻陈?谨勒专使,聊附此情,不宣。

△△状上

与道士书 (P.3502)



奉别多时，常思顶礼。时候，伏惟尊师道体安和，逍遥

紫府，侧迹清虚，学道法而乘云，念飞仙而贺鹤。

弟子△△属

有诸事，礼谒未由，益增恋结。谨奉状，不宣。弟子

△△状上尊师法前。

录自张编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里的《朋友有疾相问书》、《与道士书》，确实更使人感到简明易懂，适用儿童学用，这正是张氏编撰地方书仪教材的根本目的。

(3) 字典：敦煌文献里，还存有 5 个写卷（P.2058、P.2717、P. 3906、S.619、S. 6204）的《字宝》（又名《碎金》）一书。该书序文云：

“……今天下士庶同流，庸贤共处，语论相接，十之七

八，皆以协俗。既俗字而不识，则言话之讹弛残矣。

……余今讨穷《字统》，援引众书，《翰苑》《玉篇》，数

家《切韵》，纂成较量，缉成一卷……号曰《字宝》

……谓之《碎金》……”

今从《字宝》序言已知：逮自唐代，在雅言通用的同时，俗语亦颇为风行，并出现了雅言协俗的新的语言情况。为了适应唐代语言发展的通俗化的潮流，儒士们遂摘录了《字统》、《切韵》等书中的一些俚俗之字，编纂了《字宝》一书。其书署名有白居易者，也有郑惠卿者，可是，作者实难确考为何人，学界也因无据存疑之。该书在编纂上，依照四声排列，计收词语约 420 条，皆为“经典史籍”未见的，全属当时民众日常生活中多已普遍使用的俗字：如人眼蔎（音花）、笑哢哢（由伊反，今按义，同咦）、手掇掇（乃和反、素和反）、寒疹疹（所锦反）、物窖窖（音教荫）、声薛薛（音蓬）、人𡗗𡗗（音比姿），等等。这些既按反切、又用汉字注音的俗语词典《字宝》，对于当时读书习文的儿童来说，自然也要学习和使用。所以，



《字宝》一书，当属于应用类教材范围的字典工具书籍。由于它是依照平上去入四声编纂的字书，这样，既可使学生在认识每字读音和字义的同时，还知道了每字的四声，因此，《字宝》不仅具有使儿童字韵兼学的优点，而且还具有适应唐代社会诗风盛行的实用价值和意义。可见，《字宝》是一本有益于敦煌古代儿童学习应用的俗语字典书籍。

(4) 算书：这类应用课本中，包括有单独的《九九乘法歌》(S.4569)和各种算书，其写卷也多达10个以上，内容实用而广泛。如《立成算经》(S.930)中的计量规定，和《算经并序》(P.3349)中的乘法口诀与乘方知识等。还有的写卷，是关于田亩、堤、马等物的测量和计算方法的；更有以多少步能合为多少亩的一种量法。其中有些算法虽失精确原理，但却简便易懂而实用。这些浅近的算书课本，也与习字、书仪和字典一样，都是属于敦煌儿童应用课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敦煌古代儿童课本中，还有《汉藏对译字书》(P.2762)、《汉藏对译〈千字文〉》(P.3419)、《汉藏对译〈佛学字书〉》(P.2046)、《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P.3823)、《涅槃经难字》(P.3578)、《杂字》(S.5643、S.5513、S.5514)、《六合千文》(S.5467)、《文词教林》(P.2612)、《辨才家教》(S.4329、P.2515、P.3622、P.4034)、《兔园策府》(S.614、S.1086、S.1722、P.2573)等写卷。这些课本的产生和来源，有的直接与吐蕃统治敦煌而蕃人儿童学习汉字和寺院办学等原因有关，应当属于敦煌独有的一类；有的是为了适应唐代科考需要而专为儿童应试编写的书籍。当然，敦煌地区的儿童课本众多和繁富，既有以中原传入为主的原因，同时，也兼有大量的地方教材。这样，不仅构成了敦煌地区儿童课本的丰富内容和多样性的题材，而且还使敦煌儿童课本更具有多民族的风貌及其地域特色。



编辑凡例

(一)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繁富多样,约有 20 余种,总数超过 200 多个写卷。其中文义前后多不相连的单纯识字课本部分,前言里亦有简述,书中一概略之。本书只编收并注解《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三种。这样,本书就已基本上反映了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的识字、教育、应用三方面的总貌。

(二)本书编收并加注解的《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三种,既是中原早已佚亡的儿童教材,又是见于我国典载的课本。将其校释成可读的儿童课本,不仅是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古为今用,而且更有促进我国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三)在注解上,力求准确、简明、有据,并与原文本义相一致。注字时,尽量将书中的

